

(上接 B5 版)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0年5月，人民政府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中心的戏曲改革工作。北京的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叶盛章、袁世海在文化部戏曲改进局领导马彦祥的说服动员下，促成了李少春的“起社”与叶盛章的“金声社”合并，随即组成以李少春、叶盛章、袁世海为主的“新中国实验京剧团”。不久即由马彦祥主持请他们这些大名角，参加了由戏曲改进局所属的京剧研究院，成为北京市第一个由民营转为国营的戏曲剧团。随之，1951年3月5日，由时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的京剧名家周信芳出任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团长的国营京剧团成立了。同时，如国营上海市人民京剧团和新民京剧团等一大批由私营戏班合并的公营剧团也相继诞生。面对戏曲界刮起的剧团所有制变革的旋风，言慧珠心里有自己的盘算，她依然幻想着能够和自己的梅师一样（1950年，几乎在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成立的同时，北京市批准梅兰芳、程砚秋等四大名旦相继成立了梅、尚、程、荀四大私营剧团），能在上海再组她的“言剧团”。

1953年10月中旬，言慧珠作为私营剧团班主，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在朝鲜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风餐露宿慰问演出活动。言慧珠第一次真切受到了强烈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期间，言慧珠特别认真观摩了朝鲜歌舞剧《春香传》，其剧情颇似我国京剧之经典剧目《玉堂春》。言慧珠被这出酷似苏三之春香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1954年1月从朝鲜回国后，她集编、导、演于一身，整天忙上忙下，苦思勤作把《春香传》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两出国内外名剧移植到京剧舞台。她满怀信心和辛劳带着新剧目到北京巡回演出，取得了空前的轰动，可谓名利双收，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元。在当时这样的巨额收入可谓天文数字（当时国家行政一级不过五百元左右，毛主席主动辞去一级只拿二级工资；国家演员文艺一级是当时工资最高层也不过一千三四百元，一般工人不过三五十元月收入），后来慧珠回上海用了八千元购置了华园别墅，这个时期当是她一生最得意的时期。

旁若无人天马行空

虽然言慧珠也不时试图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但她还是承受不了让她伤筋动骨的剧团所有制巨变。在剧团所有制的改造中，让她放弃其苦心经营的私家班底，并入国营剧团，她很不理解，也颇不情愿。在京期间，她开着当时北京少见的美国雪弗兰豪华轿车，提着大闸蟹，去找当时文化部专管戏剧改革的局长马彦祥、云燕铭夫妇诉说自己的苦闷。那时小学三年级的我到同窗好友马思猛家玩，巧遇言慧珠拜访其父马彦祥，亲眼目睹了她的风采，领教了她的作风。当时我和思猛正在院中抖空竹，忽闻门铃大作，我便随思猛去开门，只见一身材高挑穿着时髦的女人一步跨进门坎，她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就冲着里院大呼“马局长！马局长！”，其人其声就像一阵旋风似的，从大门、二门一直刮到前后院每个角落，直到主人忙不迭出迎为止。马彦祥、云燕铭夫妇曾多次动员她留在北京发展，后来在马彦祥的苦心协调下她参加了北京京剧团。而她那我行我素的极端任性让领导总是“不放心”，她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作风，在刚刚成立的新型国营剧团里十分孤立，终导致她心血所成的《春香传》停演的尴尬窘境。做惯了班主总是发号施令的言慧珠哪里受过这般委屈和窝囊。1955年1月，她在以泪洗面中选择了服用安眠药试图以死表达自己的哀怨，震动了京师上下。不得已又经文化部出面上下疏通马局长亲自批准，言慧珠匆忙调离北京参加了上海京剧院。

当时的上海京剧院，几年筛选已经有李玉茹、童芷苓两位头牌旦角儿明星了，加上言慧珠，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此编配，言慧珠的演出机会自然不会很多；从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一年只演了13场戏。旧戏班历来是名角儿单挑班走南闯北，名伶们是台下不见台上见，常有同城打擂台，明里暗里叫劲的事情发生。只有唱堂会、演义务戏时才凑到一起同台献艺。而上海京剧院的旦角三足鼎立，争芳斗艳的不合理配置，岂能风平浪静天下太平？本来就性情孤傲且一点戏功都不吃的言慧珠，顿生“进了京剧院，戏都唱不成”的牢骚满腹。仅一年光景，言慧珠在上海京剧院也呆不下去了。1957年5月，经文化部批准，言慧珠被调到上海戏曲学校任副校长，这一来，登台公演机会就越发少了。恰逢其时，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宣传工作会议，言慧珠在会上发言，指出在戏曲工作领导中存在的分配演出不公等问题。这次会议标志了文艺界整风鸣放运动全面开始。言慧珠在会上大呼“我要演戏”“让我演戏。”她的发言被上海报纸报刊全文刊载，并被解读为“极端的风头十足的个人主义”。不久“反右”运动铺天盖地中开始了。老朋友许寅在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的暗示下，忙去为言慧珠指点迷津。后来言慧珠在文艺界群众大会上做了深刻地检讨和反省，主持会议的徐平羽借势说道：“言慧珠同志的检查很深刻，态度也很好，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言是在周恩来总理与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的细心保护下，花了整整3个月，让她作了“极为认真的深刻检讨”，最终才过了关，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在孤独中奋进

1958年1月26日，言慧珠飞抵北京，在准备赴西欧演出剧目的三个月期间，就住在她恩师梅兰芳护国寺1号家中。她抓住这次来京难得的机会，于准备出国剧目的同时，在梅兰芳的精心指导下坚持每晚说戏、排戏，刻苦学习梅派艺术。此时



言慧珠在上海华园。

绝代梅派名伶言慧珠

言慧珠步入了她艺术生涯的黄金岁月。她结合自己喜爱昆曲、擅演武戏的优势长处，把《木兰从军》、《天女散花》、《嫦娥奔月》、《贵妃醉酒》、《西施》、《洛神》等等都进行了提炼加工，创造性地继承梅派艺术，开拓梅派表演艺术领域。她改编演出的《木兰从军》以甜美的嗓音、优美的身段、扎实的武功令行内人钦服不已；她为《龙凤呈祥》中孙尚香创造了独有的水袖动作、为《太真外传》中杨贵妃设计了在一张转动圆桌上载歌载舞的“舞盘”，每当演出时都能博得满堂彩声。她多次与名武生高盛麟合作的《霸王别姬》，被誉为是继梅、杨二位大师之后的此剧最好经典，完全再现了梅、杨的神韵和风格。但这些成就并没有给不入俗的言慧珠带来多少好运，在戏曲舞台的舞台上，总是不时伴随着磕磕绊绊。

言慧珠在担任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期间，除了教授学生京昆表演技艺，仍不断争取一切机会登台献艺，她所出演的昆剧《百花赠剑》、《长生殿》都极具特色，广受行内外赞誉。她与俞振飞合演的昆剧《墙头马上》，与梅兰芳、俞振飞合演的昆剧《游园惊梦》先后被拍摄成彩色影片，当然当时对于她也是十分的荣幸，而对于后代演员和观众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国粹艺术传世之作。应当说这一时期言慧珠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舞台上还是比较顺心的。但在政治上，虽已经历了近十年的磕碰，她我行我素毫无遮拦的脾气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多少。

1961年12月，由她和俞振飞带队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访问香港并举行公演。在香港，言慧珠骨子里被压抑的“明星意识，唯我独尊”在海外一下子膨胀起来，不仅烫了当时港澳最时髦的发型，珍珠项链、翡翠钻戒又再度回到了她的身上、手上。

江青：叫言慧珠别演了

虽然言慧珠会经常做出一些令各级领导头痛的事情来，但她仍然受到中央领导的礼遇。1963年2月中旬，马彦祥接俞振飞长途电话，说他和言慧珠二人拟来京与中国京剧院合作演出（实为借中国京剧院的演出班底）。马彦祥随即请示文化部主管副部长徐平羽同意，在马的协调安排下中国京剧院也表示了欢迎。俞、言夫妇得到马电话答复后，遂于3月初来京，与中国京剧院合作演出十余场，周恩来总理还特意观看了他们精彩无比的联袂演出。4月上旬，周恩来总理特邀俞振飞、言慧珠、马彦祥等赴中南海西华厅总理家谈话。当谈到近一时期舞台上的演出剧目经常受到毛主席批评和舆论指责时，周总理深有所感地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们的戏剧总是以反映当代的生活为主，古典戏总是少数；只有中国舞台上演的，大量的表现古代生活的传统戏，而表现现代生活的戏却很少。我们有那么多的丰富的戏曲遗产，当然是好事，但是，其中经过推陈出新，真正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优秀剧目，为数总是显得太有限了。接着总理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能不能把传统剧目（主要是指京剧）排排队，从中选择那些内容比较好，而又能保留各种唱腔和生、旦、净、丑各行当的表演技术的剧目，再在全国范围内约请几十位懂行的剧作家，每人负责整理改编一两本，一年之内整理完毕。总理说，以后再编戏，就要求用新的观点编写新的历史剧，给人以灌输正确的历史知识。总理谈了他的设想以后，把目光投向俞振飞、言慧珠问：“这个计划行不行？”言慧珠抢先表示：“行！”

马彦祥后来在回忆周恩来总理这次对京剧改革意义深远的谈话时，十分痛惜地说：不料不到一年，第一届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中，江青开始兴致勃勃而又蛮横地插手了，全面攫取了京剧革命的果实，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后果不但葬送了京剧改革，同时也葬送了传统戏曲的推陈出新，以致总理生前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言慧珠聆听了周总理一席话，年轻好胜的她决心为戏改做点事情，为此特意编排了她有亲身体会的反映抗美援朝的现代戏《松骨峰》。谁知已经插手文艺界的江青得知后，放出话来：“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找这里沾边！”一句话，似三九天冰水泼头，让言慧珠再也没有机会登台。自1964年夏，第一届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开始，她再也无戏可演。这对于爱戏如命的言慧珠来说，可谓致命一击。

绝代佳伶的挽歌

言慧珠虽生长于北京，但她身上流淌的是蒙古族祖先的血液；有着牧马人鲜明的豪爽性格。她直言不讳，敢恨敢爱；她不管别人爱憎如何，一意孤行。她敢于向她喜欢的男子示好，甚至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渗透着草原上的浪漫习俗。而她确从未得到过一个男人真正的理解和关爱，这是她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和无处倾诉的悲哀，这也是她一生曾多次服药自杀未遂却被人忽略的隐情之一。

言慧珠一生所疯狂追求者有二，一为京、昆舞台表演艺术，二为希望得到男人真正的理解和关爱。

在言慧珠的恋爱史上，几乎所有看上她的男人都是恋于她的姿色出众，但也都惧于她的落拓不羁性格。自与电影名人白云闪电婚恋后，她似乎痛悔：“没有真正爱我的人”，直到三十多岁仍未再婚。在舞台艺术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但凡与艺术相关的戏和事，她总是从不轻易放

过。从赴朝慰问回国后，言慧珠在北京驻留了大约二年时光，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她终于放弃了自己的班社，加入了北京京剧院。同时，她幻想着在北京能找一位多才博学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圈内人士结为秦晋之好，结果是有缘无份，一场空。时逢昆剧名家俞振飞自香港被周总理等请回北京，言慧珠就千方百计地接近他，想跟他学昆曲，俞自然也成为她心目中追逐的白马王子目标之一，而老俞这位“王子”已有家室，难以涉足。一切事与愿违，她的尝试与努力都失败了。青年老生演员薛浩伟于1953年间曾搭班“言慧珠剧团”，薛小言慧珠八岁，期间曾受言多方关照和提携，在其剧艺成长过程中受益匪浅。从赴朝慰问归国后本已分道扬镳，各奔前程。1955年1月，言慧珠因工作及生活追求的诸多不顺，又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薛浩伟闻讯来京探视，这才有了人们所谓的薛浩伟先生的婚姻，但言慧珠似乎一直避讳这桩事实婚姻，没有任何彩礼也没有婚礼，夫妻二人也很少一起公开亮相，且在5年的婚姻中因为演戏排戏离多聚少；而上帝却赐给了她一个随母姓的儿子言清卿。

1957年“反右”前，经文化部批准，言慧珠由上海京剧院调至由俞振飞担任校长的上海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应该说，言慧珠是并非情愿地进入上海戏校的，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却为她带来了在艺术上创造新辉煌的机遇，也给她的生活带来难得的近九年的安定平静。这也正是得益于她的舞台同仁——后来的丈夫俞振飞二人性格互补，及舞台艺术上的珠联璧合。对于这段令人诧异的婚姻，言慧珠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一方面，她想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为晚年伴侣，这是她多年的追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她似乎也有借重俞振飞这位“昆剧翘楚”“小生王子”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准与声誉的意愿。俞振飞丧偶之后，直率的言慧珠就开始步步穷追不舍。“言慧珠嫁我，是为了要我陪她唱戏”，这是俞振飞在言慧珠身后对她的评说。俞认为，言慧珠对他比较主动是出于艺术上的原因，当然自己也曾迷恋过她声色文武皆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俞振飞与言慧珠作为上海戏曲学校的两大“反动戏剧权威”，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面对“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大批判”，夫妻二人在造反派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常常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俩还被罚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还不时有人悄悄帮忙，日子似乎并



言慧珠和俞振飞合演昆剧《墙头马上》。

不太难过。但言慧珠就完全不同了，她平时锋芒毕露，易得罪人。只要见她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造反派大声责骂，这时嫉才妒色都借机发挥了。更雪上加霜的是，造反派先后数次对她的“华园”进行了毁灭性的抄家。他们把言慧珠一生唱戏积蓄的钻戒、翡翠、美钞、金条、存折都抄了出来，搜刮之细甚至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就连藏于防空洞和花池中的珠宝也难于幸免，所有名人字画和她冬季最喜欢穿的好几件名贵紫貂皮大衣也毁于一旦。但这些也许都不足以让一个人为此而轻生离世。

对言慧珠的死，后人众说纷纭。此前，言慧珠分别于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两次因感情问题自杀未遂，以今天的眼光分析，这自杀情结往往与精神或心理疾病有关。可是当时俞老对此并不了解，面对周围“言慧珠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吼声，他也不时盲目附和声讨其妻。

言清卿在《粉墨人生泪尽》一书中，有相当的篇幅谈到言慧珠和俞振飞的爱恨恩怨。对此人固且可存而不论，但是有一点是无法抹去的：在“文革”暴力残酷迫害下，作为丈夫的俞振飞如果能够与妻子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真诚地给以开导、鼓励、安慰、温暖，那么言慧珠就很可能不会是这个结局。如果没有这场浩劫，言、俞二人一唱一酬的性格可能会白头偕老，而一场暴风雨却使他们的反差性格各自膨胀，充分暴露无遗。更可悲的是言慧珠自杀当晚曾偕子跪在丈夫面前“托孤”，然而此举并未引起早已不屑她平日里一天到晚死去活来的丈夫俞振飞的在意。面对丈夫如此冷峻的面孔，言慧珠再也没有求生的欲望，最终，一条唱《天女散花》时使用过的白绫结束了这位只有47岁的美艳绝伦的名伶坎坷而又多姿的一生。

“言慧珠的一辈子活得太超前了，时代跟不上，历史不允许，使她没有生路！”著名戏曲理论家龚和德先生这番令人刻骨铭心的话，为这位风华绝世的一代名伶唱出了最后的挽歌。■